

多维度视阈下的民国学术发展

【编者按】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起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门类和学科体系,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思想,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近年来,人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较为关注,但也出现了“褒奖有加而分析不足”的偏向,将当时有限的、相对的学术自由加以夸张、美化,对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机制缺乏深入理解,对民国学者的成就及其局限缺乏理性分析,进而得出了不少错误结论。这种偏向无疑是需要加以纠正的。如何看待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及其局限?如何把握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原因?为此,本刊专门约请了五位学者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究。这些文章,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理论指导,从不同的视角多维度审视民国学术发展状况,着力探讨制约民国学术发展的内外机制及其影响,分析民国学术发展的基本轨迹及其总体特征,以期对民国学术发展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准确的历史定位。

民国学术之历史定位

欧阳哲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民国学术史研究之所以引起人们重视,缘起于20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出现的“国学热”和由思想史转向学术史的抉择。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下,胡适、陈寅恪、钱穆这些沉寂一时的大师级学者受到学界的追捧,他们的作品成为畅销书籍不胫而走,回归传统、复原历史成为学术演进的新动力。时经近三十年,今天我们来关注民国学术史,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历史是学术前行的基础,但进步毕竟以超越为标志。因此,我们现行的民国学术史研究须站在新的制高点上,以超越前代为目标。

一代有一代学术。民国学术之所以自成为一个单元,其根据在于它拥有区别于前之清代学术、后之新中国学术的精神特征、学术制度和学术风貌。清代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高峰,人们常以朴学、汉学、考据学赅而括之。晚清随着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和西学的大力引进,新学开始兴起。新中国学术则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建立密切联系在一起,前三十年带有浓厚的“苏式”色彩,学术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约制;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新时期四十年摆脱苏联模式,大力引进西方学术,在改进既有学术机制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既不同于僵化的“苏式”学术制度,又有别于相对自由的西方学术机制,它以国家规划、社会需要与学者意愿相结合,其学术形态自成一格。

民国历史不过三十七年。政治上以共和制翻开中国新的历史篇章。文化学术则以新文化运动终结了传统的儒学意识形态,将晚清出现的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确立为正统。虽然清末登台的名流学者,诸如康有为、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罗振玉在民初学界仍拥有重要影响力,但已不

在学术前沿。代之而起的是蔡元培、王国维、胡适、赵元任、杨树达、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郭沫若、傅斯年、李济、余嘉锡、柳诒征、蒋廷黻、李剑农、萧公权、王世杰、钱端升、陶孟和、何廉这样一批学者,他们成为新学术的领军人物。从晚清起步的学术转型成为不可移易的趋势,大学废除经科,打破传统经史子集的图书门类分法,全面引进西方的学科体系,建构新的学科研究框架,中国近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之划分和研究范式次第登场。新型大学为提升学术水准,建立了一批新的学术研究机构,闻名于世者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文科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1928年中央研究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研究进入国家体制。新知识群体为自身的发展,以弘扬人文、发展科学为职责,创办学术刊物,设立学位制度,评聘学术职位,奖励学术著作,确立现代学术体制。传统学术在新观念的烛照下焕发新的活力,有着历史考证传统的中国史学,凭籍发掘大量新的历史材料,即人们称道的“四大发现”(殷墟的甲骨文、汉代居延汉简、隋唐敦煌文物、明清大内档案),出现超越清代乾嘉汉学的势头。新知识群体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激励,大力拓展中国传统学术研究范围,将小说史、戏曲史、民俗、歌谣研究这些为士大夫不屑一顾、不登大雅之堂的“流俗”作为研究对象;西方的学科观念与中国的传统学术交融互动,产生了一批新人文的经典性学术成果,在文学史领域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哲学领域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金岳霖的《知识论》,在历史学领域有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有人称这是中国学术新的诸子百家时期,有人视之为中国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从学术变迁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亦即中国现代学术形态的生成时期。

民国学术呈现出不同于清代学术的历史形态。它以引进西方学术制度为主导,以现代学科体系为架构,以新型的大学、研究院为学术单位,以生产新学术成果为导向,从此中国学术进入一个迥异于传统学术的历史新阶段。由于民国历时短,加上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学术运转时常处在非正常的情境,学术生产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其学术成果的总量自然有限。

民国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历史时期,传统学术的历史底蕴对这一转型构成制约。这首先表现在知识结构上。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已按西方学术制度作学科化处理,形成新的学科体系,但传统文化仍是新文化人的主要知识来源,在文史哲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如此。传统学术的“通识”特征对新文化人纵横驰骋于不同学科提供着强有力的知识资源的支持。同时,由于学科分科体系初步形成,传统文本常常成为多学科的经典文本素材,新学术的大家身跨文史哲多学科的现象也不乏有之。从中国现代学术的演变来看,传统学术遗产浸润民国学人,成为他们据以傲视后来者的一大优势。

民国学人对西学趋之若鹜,西学成为他们战胜传统学术的有力武器。但西学毕竟是初期引进,宏观现代学术的建构,虽然在体系上、制度上,它整体替代传统学术体系、学术制度,但若微观透视,对民国学人的西学素养又不可估价过高。除了个别留学西洋归来的“海归”在西学素养上与西方学者能够展开对话,绝大部分留学生尚只停留在学习、介绍的层次,高水平的西学成就远谈不上,这也是中国科学界长期难以问津诺贝尔奖的深层原因。

民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政治是时代的中心,政治冲击学术,政治冲淡学术,政治约制学术,学术因此常常变得无所适从。学人与政治的关系极其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参政的学者型官僚、议政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一介书生。即使后一种选择,与政治也难脱干系,有

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关系。

梁启超定义近代中国为“过渡时代”,民国学术史也是如此。这种过渡期的学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中西新旧的结合。由于西方文化是强势话语,结合的价值取向往往是以西贬中,以新胜旧。传统学术受到了极大贬损,传统学术资源的开掘受到限制。作为传统学术主干的经学意识形态基本上被解构。

鉴于民国学术的上述情形,葛剑雄先生的看法可备一说:“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①从传统学术的视角看,民国毕竟是传统文化的衰落时期,因此传统学术的表现在这时期明显受到了相当的抑制,就这一点而言,民国学术确不如清代乾嘉汉学,但与后来身陷传统文化断裂层的新一代学人相比,其古典遗传又要丰厚。从外来学术的引进看,虽然大力输入西学,但因是初期引进,就不免粗制浅薄,与西方有关的学科建设基本上停留在译介、模仿和撰著教科书层次,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学术当然又是后来居上。胡适、陈寅恪在时人的眼中,也许是以西学、新学见长;而在今人看来,他们又可能遭遇相反的评断,人们会更推崇他们的所谓国学根柢和成就。

中国传统学术自古有修治学术史的传统。先秦有《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汉代有司马迁的《史记·论六家要指》《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儒林列传》,都是较早的学术史文字。以后各种有关历朝历代学术史的文字著述不断有之。明末黄宗曦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更是学术史的鸿篇巨制。清代纪昀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中国传统各种学术专著加以部勒,对各学术流派的发展脉络分门别类加以述评,堪称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总结。近人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被视为总结清代学术的经典之作。遗憾的是,有关民国学术史的研究,迄今未见有分量的通论性学术专著问世。出现这一情形,与民国学术的分科制度的形成有密切关系。人们已习用新的专业学科眼光探讨学术史,传统的学案体或通论性的学术史著作已被扬弃。梁启超式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样的经典制作似成绝响。

开展民国学术史研究,其目的主要是清理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发掘这一时期丰富的学术矿藏,为中国人文学术继往开来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历史文献。

研究民国学术史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通过描述民国学术进程和学术格局,勾勒这时期学术发展的脉络和基本走向;将学术史研究置于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去考察,探讨它们的互动关系;注重考察民国学术的渊源流变和师承关系,它们形成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范式;全面考察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对推动这一转型的内部革命动力和外来学术的刺激给予全面地透视;重新检讨民国学术的评价体系,对当时学术评价机制和学术界的基本取向作一通盘考察,以期能较全面地反映这时期的学术面貌和学术工作实绩;注意从价值层面考察这时期学人们所形成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展现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注意对在这时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机构、社团和刊物的评介,多层次地表现民国学术发展的纷呈局面;评介这时期中国学人为传播中华文化所做的工作及其与外国汉学家的互动关系,对民国学术的内外关系做出全新的说明。

民国学术史是一项跨学科性的综合研究,主要涉及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

^① 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

学多学科的研究。总结这一时期学术史的既有论著,从体裁和内容上看,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学术专门史之类的研究,诸如各学科的专门史,如史学史、哲学史、文学史、翻译史等分支的研究。较早者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蔡元培的《五十年来中国哲学》,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等,著者既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又是历史过程的叙述者,他们的论述自然与个人的学术倾向和立场密切相关;当代这类体裁的著作,有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七册)等,他们主要是探讨某一学科的发展史,属于学术史的学科史门类研究。第二类是具体人物的个案研究,或学术派别、学术刊物、学术机构、学术思潮的专题研究。如刘起钎著《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郑师渠著《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以爱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卢毅著《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郑家建著《清华国学研究院述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等,以及《近代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等有关近代学术大师的个案研究丛书,对近代学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期刊(如《国学季刊》、《学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派别(如“古史辨”)的专题研究,都属此类。第三类是传统学术在近代研究,如近代经学、佛学、诸子学、国学等领域的研究。现今的民国学术史研究论著,多为人物个案研究和学科史研究,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某一侧面反映了这时期学术发展的情形,构成我们民国学术史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

研究民国学术史,具有不同于传统学术史的特点:在体例上,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学案式体例或今人的个案研究,只局限对某家某派的学术思想和活动逐一论述,也不同于通行的史学史、哲学史,只限于对某一学科的发展作系统的评介,而是将民国学术置于广阔的文化思想背景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去考察,对这一时期学术变迁的外部氛围和内部流变作全方位的深度透视。

在思路,以民国学术为研究对象,自然有意评述民国学术的独特地位。从学术形态上看,民国学术既不同于前此的清代学术,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又不同于后此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学术文化,它构成新的相对独立的学术单位。在整个中国学术史发展中,民国学术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期,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抓住民国学术转型这一特征,设置一些与学术转型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在追溯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变的基础上,力求对学术转型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给予深入的探讨。

在观念上,民国学术史应与以往过于强调中国现代学术形态的形成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殖民”性质不同,亦与近年国学研究中某些单纯强调现代学术的传统起源说的倾向有别。它应既重视这时期学术转型过程中西学输入有关的“影响”研究,同时有意凸显传统学术在现代新学术产生过程中的“支援”作用,以及“内据”的性质。从而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作一比较客观、全面的解释。

在方法上,研究民国学术史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对具体人物和学术成果的分析评判以实证为依据,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除了充分利用学者本人的文集、书信、日记这些“本证”外,还应注意发掘新的材料,充分吸纳各种“旁证”,如报刊、档案、回忆录。注意吸收和借鉴新的史学方法,如解释学的方法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改善研究工具,使这项研究不是“炒冷饭”,而是返本开新,推陈出新。

在内容上,现今的研究多涉及学术史的局部,欠缺总体性的系统考察;对民国学术的渊源流变和

它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欠缺较为全面的研究;对民国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新学术群体的崛起、新学术机构的建设,近人对清代学术的清理和总结,近人中国传统学术观念的变迁等,尚欠缺有力的研究,这些都有待人们去弥补。

研究民国学术史应该清理的基本问题包括:一、民国学人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认识及其总结。二、晚清传统学术的变异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机缘。三、新学科框架的建构。诸如传统的分科体系、西方的科学观念与学科观念的传入、清末民初引进的西方学科体系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对应关系、西方科学观念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解构等问题。四、西学的输入、西学译介主体的转换(从外人到国人)与中西学术交流中“格义”方式的转换。五、社会转型与时代对新学术的呼唤。转型时期民国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民国学人“学术独立”品格的养成。六、从晚清到民国,学人(以江藩、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钱穆诸人为代表)对清代学术遗产的清理与总结。七、新学术范式的诞生以及民国学人对新学术范式的争论和检讨。如文学领域的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历史学领域的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哲学领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八、新学术机构的建设、新学术社团的出现。如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研院史语所等新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及其学术工作的开展。九、“整理国故”之观念的由来及其成绩。从《国粹学报》的国学研究到《古史辨》的历史研究,民国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检讨。十、民国历史学的新发展。诸如新史料的发掘、新史学方法的传输、新史学体裁的出现、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传统史学的继续发展等问题。十一、哲学学科的设置与发展。如北大哲学门的设立,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确立与书写,西方哲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逻辑学研究的开展。十二、民国文学研究的新发展。如“文学革命”带来的文学观念变革,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拓展,西方文学理论与作品的译介。十三、以辜鸿铭、胡适、林语堂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译介。十四、外人与民国学术的互动及其影响。如罗素、杜威、泰戈尔等人在华的演讲活动及其影响,以及欧美、日本汉学家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及其互动关系。十五、民国学术的历史地位及其估价。

民国学术史研究已有相当雄厚的文献基础。新时期整理出版的大型民国学术史方面的资料有:《民国丛书》(上海书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丛书》(东方出版社)、《国学丛书》(华东师大出版社)、《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岳麓书社)、《中国近代思想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近代国学文献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时期国学期刊汇编》(巴蜀书社)这些都为研究民国学术史提供了必备基本资料来源。

客观地描述民国时期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演进,再现民国学人为推进中国学术所做的艰巨工作,清理他们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当代中国学术向前推进所应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相信,通过展开民国学术史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晰、更细致、更客观地理解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状况,而且对推进当今的学术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民国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及其局限性

左玉河 (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在近代学术制度转型过程中,效仿西方逐渐建立起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体制。这套现代